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建安文学及其影响研究》  
成果鉴定材料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复印报刊资料

RESEARCHES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中国古代、 近代文学研究

ERIC

中国人民大学

资料中心

CHINA RENDAI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CENTER

2001年

第

3

期

月

刊

J2



## 传统文士人格与“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

张振龙

(陕西师范大学 文研所,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传统文士在春秋战国崛起时,对道与势的态度经历了由对道的恪守到对势的依附的转轨过程。汉以后,由于儒术的强化、引导、依附权势成为传统文士人格的普遍特征。“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就是这种特征在西晋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自然显现。与文学史上其它文士集团相比,“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表现得最为典型。

**关键词:** 传统文士;人格;附势心态;二十四友;西晋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00)04-0063-04

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文士的崛起时期。其时,诸子蜂起,儒、道、墨、法等学派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求治国安邦、立身处世之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哲学模式,它们彼此激荡,相互影响,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士人格的多面性和安身立命的两难处境。且不管各家之间和各家自身内部主张怎样不同,都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它们的产生都是缘于当时的礼崩乐坏、时局的动荡和政权的争夺。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共性特征:与政权政治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主张都是对政权政治态度的集中表现。正如司马谈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政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中国传统文士在其崛起的时候,其人格就是多面性与共性的统一。而中国传统文士的人格特征是由他们对道与势(权势)的态度来昭显的。

自春秋至战国初期,传统文士对道与势的态度表现出重道轻势的主导倾向,《孟子·万章下》载:“(鲁)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乎?”鲁缪公以友对待子思,子思之所以不悦,就是因为他不甘屈居友位,想以师自居。《战国策·齐策》记载有赵威后问齐使的这样几句话:“于陵子仲尚存乎?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表面上看赵威后对子仲不臣于王、不索交诸侯极度不满,甚至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但从另一方面正好说明了当时文士蔑视政治权威、以道自负的态度。同时由鲁缪公到赵威后对他们的态度也流露出统治者以势压道、以势抗道意图的日益明显,自高其道的文士在强大的势力面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到了战国后期以后,传统文士对道与势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轨:大多文士从以前对道的恪守变为对势的依附,由以道抗势转为

收稿日期:1999-12-12

作者简介:张振龙(1966-),男,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复印报刊资料

# 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近

( 月 刊 )

主 办:中国人民大学  
 中心主任:邱金利  
 总 编 辑:宋志明  
 副总编辑:邱海平  
 顾 问:何西来  
 责任编辑:周海莹  
 编辑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地 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  
 邮政编码:100007

## 【综合研究】

古代文人的桃源情结  
 夸父神话和逐日巫术  
 古代诗歌的当代定位  
 汉语古典诗歌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  
 ——兼述《汉语诗律学》以来之近体诗句  
 法研究  
 骚体赋的界定及其在赋体文学中的地位

赵山林(3)  
 张春生(11)  
 赵敏俐等(128)

孙力平(15)  
 郭建勋(21)

## 【先秦及魏晋六朝文学】

《诗经》与夏商周西部开发  
 传统文士人格与“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  
 庾信入北的实际情况及与作品的关系  
 加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

赵 雨(26)  
 张振龙(32)  
 牛贵琥(36)  
 李剑锋(45)

## 【唐宋文学】

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  
 唐诗研究的世纪回顾  
 从负重生活到艺术生活  
 ——佛教与盛唐诗人生活态度  
 变文变相关系论  
 ——以变相的创作和用途为中心  
 宋代杜诗学论  
 文官政治·书卷风流·人文气象  
 ——宋代文学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论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倾向  
 童心与诚斋体  
 《菊磻集原序》《林湖遗稿序》考释  
 欧阳修、曾巩论墓志铭  
 ——古代传记理论研究之一

陈友冰(52)  
 许 总(66)

傅绍良(73)

李小荣(79)  
 聂巧平(88)

刘 畅(94)  
 朱玉麒(102)  
 黎烈南(111)  
 祖保泉(119)

俞樟华(129)

以道附势。文士追求仕途、利禄成为普遍之风尚。荀子对此曾进行了如下描述：“今之所谓士者，汗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荀子·非十二子》）何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二方面的原因。

其一，诸子之道，主要源于政局的动荡，一旦政局相对稳定、政权强大之后，统治者不会让其道自然发展，必然要对其实行约束、控制、利用，甚至进行政治打击（赵威后对待子仲的态度就是例证），结果诸子为让其道存在下去就表现出对势的趋附。

其二，诸子之道都是传统文士为当时统治者提供的治国之术，道的功能就是为势服务的，这就决定了道产生伊始就与势有一种主动依附倾向。只不过各家为了突出自己道的独特价值（因为道是否有价值主要取决于掌权者采纳与否），才显示出以道抗势的态度，形成了传统文士重道轻势的现象。但道与势经过一段的对峙，权势就呈现出比道更强大的力量（如果两者长期对峙下去，道就失去了其功用和价值），所以传统文士为实现其道服务于势的目的，展现其道的非凡功用和价值，不得不向势靠拢。

其三，诸子在提出自己的道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的道是治理社会的最佳方略，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统治者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必然主动向他们请教治国之术，所以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体现出以道自任、以道抗势的精神品格。“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卜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孔丛子》卷二《居卫》）传统文士这种自高其道、以道自任的精神固然可敬可佩，但他们要生存，不能为了道忍受守节固穷的潦倒生活。李斯对老师荀子对士不能以道自任、竟堕落到“贪利”、“嗜势”之境的责备所做的辩解就是最好的明证：“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当时的文士为了摆脱地位之卑贱，生活之困苦，亦不再讲道的原则，趋附权贵、猎取富成为人情之所向。

传统文士日益重视权势的趋势到了汉代，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化、引导，又得到了加强。儒术不仅成为文士追求的利禄之途、仕进之阶，而且文士与国君之间结束了战国后期稷下先生与国君之间的师友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这表明文士的道已无法与统治者的势抗衡。传统文士面对强大的势，不得不屈道附势，从此，中国传统文士正道直行、以道自任的殉道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不得不随统治者的权力更替而起伏动荡，其出处去就亦必然随政权的易位而颠簸不定。这一方面使传统文士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陷入出仕与入仕、独善与兼济、贫穷与富有、卑贱与高贵的两难抉择；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文士在中国古代宗法专制制度下，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抗节独行。依附权贵实在是宗法专制社会中传统文士难以治愈的通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怀才不遇、人生苦短、忧国忧民、羁旅行愁、逸情山水、学道拜佛等主题，也是传统文士依附权贵心理在文学中的曲折反映。

依附权势既是中国传统文士的普遍心态。而“二十四友”依附贾谧是这种心态在西晋惠帝朝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自然显现。西晋惠帝统治时期，政治上的腥风血雨使文士认识到要想在现实中生存必须得寻找一位权贵作为靠山；郭象玄学的“独化论”在这方面为文士的言行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他们可从适性、称情的角度为自己依附权势找到依据；<sup>[1]</sup>这些恰好与传统文士人格中积淀的附势心态达到了高度一致。所以才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士集团中依附权势

表现最为典型的“二十四友”。

首先,中国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士集团基本上是文学团体,而“二十四友”是一个政治团体。一方面“二十四友”中的成员本身大多并非文士,特别是其领袖贾谧更不以文才著名。而其它文士集团的成员都是文人,其领导者就是当时文坛上以文学成名的名流。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竟陵八友与萧子良、苏门六君子与苏轼等。另一方面,“二十四友”并没有大体一致的文学主张、创作倾向及文学风格,没有掀起在当时主导文坛的创作潮流。虽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创作观点,但这仅是某个人的意见,对“二十四友”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二十四友”作为一个文士集团并不是以文学活动为主,他们更多地投身于政治活动。虽然他们也有金谷集游之举,且“引致宾客,日以赋诗”,(《晋书·刘琨传》)从根本上说这仅是当时浮夸交游士风的体现,并不以文学为目的。他们也有彼此赠答之作,大多是“著文称美(贾)谧”,(《晋书·刘琨传》)或“以文才降节事谧”,(《晋书·贾充传附贾谧书》)具有明显的政治上的称誉目的,更何况这种赠答在他们之间也不普遍。其他文士集团则以文学活动为主,他们经常聚集一起,切磋文心,酬和争胜,在领导者的主持下编纂各种有关文学书籍等。如萧统“与学士商榷古今”,(《梁书·昭明太子传》)又编纂《文选》等。与“二十四友”以文才媚事贾谧截然不同。可以说“二十四友”主要以政治活动为主,仅把文学作为政治活动的点缀;其他文士集团则以文学活动为主,让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人生。

其次,“二十四友”都把谄事贾谧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中间,有的想借权贵踏入仕途,实现其建功立业的理想。如左思,他深知在那“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的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出身庶族的他要想“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必须依附权贵;有的是希望重新树立已失去的自尊,再现自己家族的辉煌。如二陆,他们是东吴名门之后,“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晋书·陆机传》)而今他们却成了亡国臣子,被江北统治者和文士所歧视(晋武帝在公开场合曾说吴人赵睢、屢作妖寇、范阳卢志于众人之前直呼陆机祖父之名就是明证),故二陆栖迟洛阳数年,只做了祭酒、太子洗马、郎中令等官职。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让北方士族刮目相看,也只有投靠权贵;有的是想过一种安于天命的生活,如挚虞,他知道他生活在一个“履言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晋书·挚虞传》)的特殊时期,要保生全身,也要寻找一个生活的避风港——权贵;有的是为了保持现实生活的富有、奢侈,提高自己的名声地位,如石崇、潘岳,他们为追求“身名俱泰”(《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的生活,也需要一位权贵作为后台。而在当时惠帝统治的现实社会里,贾后专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贾谧乃贾后宠儿,权倾人主,这便促“二十四友”为了各自之目的,不得不媚事贾谧。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士集团,同一集团成员大体上志同道合;虽然亦有不同程度的附势表现,但却不把它做为实现自己目的的主要手段。他们或以文会友,切磋文心,如竟陵八友与宫体诗作家,或以讲学进行学术交流,讨论学术问题,如明末的东林学社和明末复社等,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不同于“二十四友”以附势来实现其理想的特征。

其三,从交友原则来看,“二十四友”把势利作为自己交友的重要尺度,谁有势就投靠谁,谁对己有利就与谁交友。如潘岳在晋武帝太始八年(272)之前,所奉之主为裴秀,贾充继任司空后,便投靠了贾充。<sup>[2]</sup>(P653)当贾谧权盛之时,竞相依附,贾谧被杀后,又各投其主。《晋书·文苑传·邹湛传》载:“及赵王伦篡逆(邹捷)与陆机等俱作禅文。”陆机并因“豫诛贾谧功,赐爵关内侯。”(《晋书·陆机传》)他们彼此之间友情淡薄,当他们发生利害冲突时,落井下石,把对方置于死地。如牵秀、陆机、王粹同为“二十四友”之列,在司马颖讨伐司马颖时,“以牵秀为冠军将军,与陆机、王粹等共为河阳之役。机战败,秀证成其罪,又谄事黄门孟玖,故见亲于颖”,(《晋书·牵秀传》)结果陆机被杀。他们大多缺乏节操,不讲人格尊严,奴颜媚骨。时人阎缵曾上疏云:“潘

云、缪徵等皆滥父党，共相浮沉，人士羞之，闻其晏然，莫不为怪。今诏书暴构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当。臣独谓非但岳徵，二十四友宜皆齐黜，以肃风教”。（《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王鸣盛亦这样评价潘岳等人：“潘岳、石崇附贾谧，望尘而拜，不待言矣。而刘琨、陆机亦皆附谧，在“二十四友”之数。赵王伦之篡，……而刘琨则为伦所信用，晋少贞臣如此。”（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而其他文士集团，如竟陵八友中的范云、沈约、任昉等，都等于友情，奖掖后进，急人之难。再如以苏轼为中心的文士集团成员大都能够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富有正义感、使命感，在正与邪之间，敢于与邪势抗争，即使被贬，被流放，仍矢志不渝，不以势利作为处世的准则。所有这些“二十四友”无法望其项背的。

其四，“二十四友”的形成与解体是和贾谧的得势与失势相始终的。据《晋书》和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二十四友”谄事贾谧是在惠帝元康六年（296），解体在永康元年（300）。虽然“二十四友”中与贾谧一起同时被杀的只有石崇、欧阳建、潘岳等，大多还活在世上，但此后都各奔东西了，有的投靠了新的权贵，有的退居，作为一个文士集团已不复存在。而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士集团的形成与解体大都是以文学创作的兴衰和文士集团成员的相继去逝为标志的，虽然也有政治权势的影响，但没有“二十四友”那么突出明显。

“二十四友”是中国传统文士人格在西晋惠帝时期政治、文化影响集结而成的一个特殊文士集团，他们的附势心态是中国传统文士人格中的附势特征在历史上比较充分、且带有病态意味的显示。这是一个因权势而显名，又因权势而损名的文士集团。他们虽然为以后文士所不齿，但也有其可悲可怜的一面。

#### 〔参 考 文 献〕

- [1] 张振龙.“二十四友”事贾谧原因初探[J].殷都学刊,1998(3).  
[2]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Character of Traditional Scholars and Twenty-Four Friends' Intention to Attach to Bigwigs

ZHANG Zhen-long

(Chinese Department, Xinyang Teachers' Institute, Xin ya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raditional scholars' attitude toward morality and bigwigs turned from following morality to attaching to bigwigs. After the Han Dynasty, attaching to bigwigs became a common character of traditional scholar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Twenty-four friends' intention to attach to bigwigs reflected this characteristic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the West Jin Dynasty and it was more typical than any other scholar groups in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character, intention to attach to bigwigs, twenty-four friends, the West Jin Dynasty

原载《唐都学刊》(西安),2000.4.63~66



ISSN 1000-5293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Bimonth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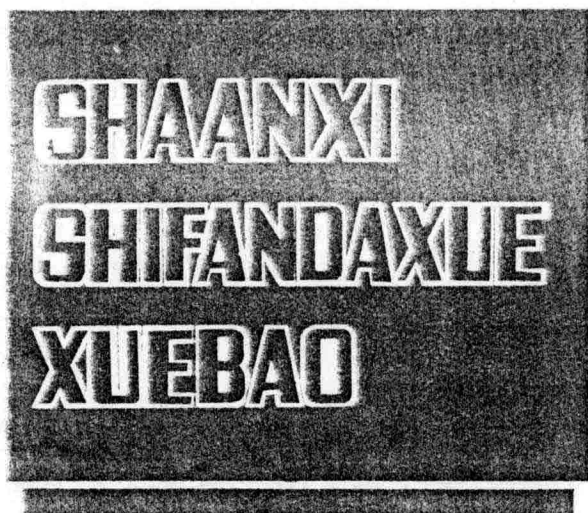
2003, No. 1 (Sum, No. 130) Vol. 32

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

**1**  
**2003**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西安 Xi'an · China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刊)

2003 年 第 1 期

第 32 卷 (总第 130 期)

2003 年 1 月 5 日出版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笔谈)

古典文学与素质教育 ..... 霍松林 (5)

加强对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 ..... 邓绍基 (8)

以开放的思维和姿态迎接新世纪 ..... 张忠纲 (9)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责任 ..... 胡 明 (11)

融会贯通 开拓创新 ..... 陶文鹏 (14)

建立理论、文献、创作三结合的古代文学博士生培养机制 ..... 刘扬忠 (15)

由余事到主导:建安文人立言价值观的演进历程 ..... 张振龙 (18)

明清长篇家族小说及其叙事模式 ..... 王建科 (25)

### 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

——《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 ..... 冯文楼 (32)

## 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学与文化

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民族性和开放性之间 ..... 童庆炳 (40)

### 再定义自己

——全球化时代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求 ..... 畅广元 (45)

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 ..... 王向峰 (54)

## 中国哲学史研究

###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定位与重构

——《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自序 ..... 陈俊民 (59)

-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 首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
- 第二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
- 陕西省高等学校十佳学报
- 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选用期刊
- 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 社会科学)收录期刊

##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 《编辑出版学论集》(第一辑)正式出版发行

由我校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张积玉编审、副所长高经纬编审、李甫运编审主编的《编辑出版学论集》(第一辑),于2002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选收入了我校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近年发表的部分有一定价值的编辑学、出版学研究论文。全书共收论文76篇,分综合篇、期刊篇、出版篇三部分编排。论文中大多或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或对编辑学有关重要实践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它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校新闻出版学教学、科研的新水平,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教学科研是一个推动。该书可供新闻传播、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学生、研究生阅读,亦可为从事书、报、刊等媒体编辑出版实际工作的同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全书41万字,定价26元。如欲订购,请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李晓娟联系。

电话:(029)5308849 通讯地址: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710062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刊,1960年创刊)

2003年第32卷第1期(总第130期)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Bimonthly, Started in 1960)

2003 No. 1(Sum. No. 130) Vol. 32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主 编 张 积 玉  
编辑出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西安市长安南路 邮编:710062)  
印 刷 长安大学雁塔印刷厂  
国内发行 西安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出版日期 2003年1月5日  
电子信箱 xuebao@snnu.edu.cn

Competent Authorities: National  
Educational Ministry  
Sponso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Chief Editor: Zhang Jiyu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ost Code 710062)  
Printed by Yanta Printing House of  
Chang'an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399 Beijing)  
Publishing Date: 2003.1.5  
E-mail: xuebao@snnu.edu.cn

ISSN 1000-5293

ISSN 1000-5293  
CN 61-1012/C

国内代号 52-58  
国外代号 Q 383

定价 5.60 元



9 771000 529020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由余事到主导:建安文人 立言价值观的演进历程

张振龙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建安是“人的觉醒”时期,为此立德、立功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追求的主导,立言仅为建安文人的余事。但由于建安文人普遍都存在着一种“志不果”、“道不行”的缺憾与苦闷,故立言成为他们补救现实缺失的途径。经过他们的创作实践,立言终于在其价值观中由余事走上主导,杨修的《答临淄侯笺》与曹丕的《典论·论文》则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

**关键词:**建安文人; 价值观; 立言; 建安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93(2003)01-0018-07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史中,建安文学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在前贤刘师培、鲁迅等人的基础上,对建安文学的渊源、成就、地位、影响、分期、特征以及繁荣发展之因、作家作品等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对建安文学繁荣发展的原因来讲,研究者从社会环境、文人思想、修养、心态、文学传统、曹氏父子的领导与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与前此相较明显地深入了。但建安文人的价值观与建安文学繁荣、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虽有涉及,却缺乏系统的深刻分析与理论阐释。我们认为对建安文人价值观与建安文学之关系进行系统深刻地研究是理解把握建安文学产生之因及演变进程、建安文学的精神特质、建安风骨的独特内涵等诸问题的关键之一。本文就是对之研究的一次尝试。

### 一、立言乃立德、立功之余事

建安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代,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的觉醒”。笔者曾就“人的觉醒”已撰文进行了论析,认为其内涵乃是人的自然理性意识和社会理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为此,渴求建功立业,重视自我才能,高扬个性,追求作为社会的和自然的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与实现,成为建安文人的新的价值取向。按传统之说法,其主导价值取向就是立德与立功。

关于我国传统文人价值观的理论阐述,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收稿日期: 2001-10-15

作者简介: 张振龙(1966—),男,河南泌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载：“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嬴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谓之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从范宣子与叔孙豹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对“死而不朽”的理解有二：一是认为“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二是认为立德、立功、立言。前者是以世卿世禄、追求血脉的世代相传为目的，后者则是以修身立德、建功立业、著述撰文为理想。同时通过叔孙豹对追求世禄的否定，他提出的“三不朽”是对当时一般世俗世禄不朽观念的突破，标志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和世卿世禄的现实观念和宗族观念局限的一种新型价值观念的确立，它把人的价值观念由现实指向了未来，由对有限人生的执著转向了对无限的追求，由对宗族血缘的关注转向了对天下社会的瞩目。这是人的伟大精神的发现，是人性发展史上的重大飞跃。此后经过孔子为知识分子设计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sup>〔1〕</sup>（《论语·述而》）安身立命之道的训导和他为其弟子开设的德行、政治、言语、文学四科的现实实践，立德、立功、立言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人毕生追求的价值目标。尤其是到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后，“三不朽”作为文人的终极价值目标在中国文人心理上得以定型。尽管政治局势、社会思潮屡经变革，但“三不朽”却始终岿然不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文化的变迁，立德、立功、立言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与主次之别，以及其具体的内涵在某些方面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就中国传统文人的“三不朽”价值观念本身来说，立德是文人的首选目标，其次是立功，最后是立言。即对传统文人来讲，修身立德是他们价值实现的最高、最完善的体现，它是立功、立言的基础，亦是立功、立言的目的。只有修身立德，才能使立功、立言合乎儒家的伦理规范和政治图景，最后实现治国平天下。而建功立业和著述撰文是立德的具体显现。立德之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而治国平天下就是最大的功业。一旦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功业受阻不能实现时，就要通过著述修文来寄寓自己的理想，为后世提供借鉴或为立德、立功服务。故立言在终极意义亦是立德的曲折表现。国平天下治之后还要人人修身立德，如此方能长治久安。故我们认为在“三不朽”中，立德既是立功、立言之基础，又是立功、立言的理想归宿，立功、立言是立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让其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原因，且明白了孔子建立四科，把德行置于首、文学置于后以及高喧“行有余力，则学以文”<sup>〔1〕</sup>（《论语·学而》）的用意与内涵。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传统文人为了立德有时要付出惨重代价，但它毕竟是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是彬彬君子形象的典型象征。虽身苦之，但心向往之。所以立德是传统文人矢志不移的追求（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相对而言，立功对于大多数的传统文人则表现出巨大的现实诱惑力。这是因为，立德上无止境，至于“至善”。然“至善”又无一客观标准，只有终身实践之，何日至于善境，遥遥无期，惟有死而后已。立功则不同，一方面它可以展示立德所达到之成效，所谓之修、齐、治、平；另一方面又可借机施展自己的施政才能。所以《礼记·曲礼》云：“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政”；《周礼·冬官·考工记》言：“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为此传统文人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皆把立德、立功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的主导。这是一条实在而又名扬后世的光明之路。汉代儒学独尊以后，以察举、征辟为主要形式的仕进制度，又为传统

文人追求立德、立功提供了现实政治制度上的有效保障,立言仅成为传统文人立德、立功之余的追求。在建安文人身上这种价值的主次之别、轻重之分亦明显地存在着,他们追求与渴望的是立德与立功。

从总体上看,建安文人会聚邺下之起初目的,是政治的,而非文学的。《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载其归曹后的一篇赞词云:“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善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归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可以说王粲对曹操的称誉,并非全是誉美之辞,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其真实情感的流露,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邺都文人的共同心愿。陈琳《游览》其二:“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王粲《从军行五首》其三:“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孔融《杂诗二首》其一:“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其《六言诗三首》二:“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三:“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曹丕在《艳歌何尝行》中以荡子妻之口云:“各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曹植《白马篇》:“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他在《又求自试表》中亦明确指出:“无功而爵厚,无德而禄重,或人以为荣,而壮夫以为耻。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刘祯《赠五官中郎将》其二:“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在建安文人中,即使是素以“轻官忽禄,不耽世荣”<sup>[2]</sup>(《魏志·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著称的徐干也具有强烈的功名之心:“奉明辟之渥德,与游珍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居之旧制。伊吾侪之挺力,获载笔而从师。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虽身安而心危。庶区宇之今定,人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sup>[3]</sup>(《金后汉书》卷93《西征赋》)在此建安文人所咏唱的主要是对“三不朽”价值观中立德、立功的热情关注与追求。相对而言,立言则成为他们价值追求的余事。曹植《与杨德祖书》云:“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曹丕《与王朗书》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徐干《中论·夭寿》篇说:“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

要之,不管是从传统文化的价值影响,还是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和建安文人的心理企向来看,修身立德、建功立业是建安文人的理想,立言只是立德、立功的余事。

## 二、由立德、立功至立言的价值转移

在人类发展史上,现实往往会开令人凄楚而又无可奈何的玩笑。那就是当人们从事一项切实而又急迫的工作且激情被激发出来而转变为人的崇高理想时,现实却抑制、阻挠甚至破坏理想的实现,致使人们的价值企向发生转移,且意外地取得十分突出的成绩。这种情况不仅会出现在某一个人身上,而且还可能出现在某一时期的群体或某一阶层人士身上。

建安时期的文人就是如此。董卓之乱致使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sup>[4]</sup>(《资治通鉴》卷59);“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生民不见所识”<sup>[2]</sup>(《魏书·武帝纪》);“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百姓死亡,暴骨如莽”<sup>[5]</sup>(《全三国文》卷8《典论·自叙》)。面对如此悲惨之境,激起了建安文

人强烈的功业意识。但是令人深思的是建安文人的功业理想在现实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并且这种阻力是如此之强大,甚至毁灭了他们建功立业的理想。

首先,从曹魏统治者对他们的态度上看。曹氏父子始终是把建安文人作为文学侍从来对待的,他们大多都担任过曹丕、曹植的文学侍从之属官,或文学、或庶子、或管记室等等。王粲归曹操后,“辟为丞相掾,……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干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文学。……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移书,多琳、瑀作也。……瑒、瑋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瑒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sup>[2]</sup>(《魏书·王粲传》)。刘廙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后转五官将文学。邯郸淳为魏临淄侯文学。确如吴淇在其《六朝选诗定论》卷5所言:“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对曹氏父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攻城掠地、率兵冲锋陷阵的将帅之才,或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略之才,或是整理政务、理国治家的实际管理政务的人才。而建安文人的这些方面,相对于他们的著述撰文之才要逊色得多。何况曹氏父子在政治宣传与舆论上也确实需要一些文才超拔之人,来为其起草各种公文,以此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故曹氏父子网罗建安文人主要是看重他们的文学才能而非政治才能。

其次,从中国文人的施政才能来看,建安文人的施政才能呈现出相对缺失的特征。春秋战国时代的文人,总体上说还比较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与处理能力之培养。但到了汉以后,文人仅以埋头诵经为务,尤其是今文经学,走上了神学化、谶纬化之轨道,就是古文经学也主要以训诂章句为主。故其处理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之能力日益衰退。再加上儒学成为利禄之途,只要经谈得好、背得熟,就可仕途顺利,平步青云。这又为传统文人埋头经书直至皓首增加了驱力,亦由此使传统文人愈益忽视了实际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社会政务中担任具体行政职务或者处理具体行政事务的任务大多是由文吏来完成的。虽然东汉以后士大夫的阶层已经形成,但这个阶层是由文吏的儒化、儒生的文吏化而得以形成的。而其中文吏化的那部分儒生大多是文人的前身,他们与儒化的文吏相比,还是擅长通经能文,而实际政治才能虽较以前的儒生有所提高,但其程度还是有限的。建安文人就是由文吏化的儒生转变来的,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文吏化的儒生。他们都深受汉末儒学的熏陶<sup>①</sup>,虽然他们主要受古文经学之影响,与今文经学相比而言,务实精神比较突出,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政治才能就一定高超。如孔融任北海相时,虽“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sup>[6]</sup>(《后汉书·孔融列传》)。“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sup>[2]</sup>(《魏书·孔融传》)注引《九州春秋》刘勰言其“文教丽而罕于理,乃治体乖也”<sup>[7]</sup>(P176)。鲁迅称其“志大才疏”<sup>[8]</sup>(《致陈谦书》)可谓肯綮之论。如孔融政治才能之缺乏可以说是建安文人的共同特征。吴质在《答魏太子笺》中说:“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可见,建安文人的经国治政才能确实不敢恭维。

其三,我们从建安文人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主要以著述撰文为胜场。王粲“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① 拙作《汉末儒学与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对之有专门论述,认为建安文人主受古文经学之影响。见《信阳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

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sup>[2]</sup>（《魏书·王粲传》）。徐干“清玄体道，……操翰成章”<sup>[2]</sup>（《魏书·王粲传》引《先贤行状》）；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琰，东平刘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邯鄲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彧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sup>[2]</sup>（《魏书·王粲传》）。而关于建安七子及邯鄲淳等人理政的才能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主要突出的是他们的文人身份及善于属文的才性。曹氏父子看重的亦正是他们的这一点。

正是缘于以上原因，建安七子等人的功业理想趋于破灭。尽管他们对曹氏父子待他们以文学侍从之态度有所不满，甚至为自己整日被文书等烦琐事务所缠绕而怨愤，如刘楨《杂诗》云：“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建安文人都对待之以文学侍从怀有不满。陈琳《游览二首》其二：“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失题诗》：“沈沦众庶间，与世无有殊。纤郁怀伤结，舒展有何由。”曹植的《赠王粲》：“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生百忧。”曹植《赠徐干》：“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又曹植《赠丁仪王粲》云：“丁生怨在朝。”但他们亦无力改变他们侍从文人的处境。

除建安七子等待从文人外，就是曹氏父子之中亦存在着不满之意，不过他们与七子等待从文人之郁怨不同。如曹操之忧主在于“不威年往，忧世不治”，此忧不是来自于政治之逼促，而是源于“人生不满百”这一生死规律。曹植的不得意与七子等待从文人有一致之处，都是由政治所致，然其与七子等待从文人的不一致之点在于曹植是作为魏文、魏明的政敌被有意迫害与压制的，这在曹植的《洛神赋》、《求自试表》和《求通亲亲表》等作品中皆有典型之表现。

总之，建安时期的文人，不管是曹氏父子还是七子等待从文人，他们都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建功立业理想不能实现的不满和愤懑情绪，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本身无法解决与克服的。

在建安文人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中，建安文人不得不回归传统，回到他们的价值观念之中去寻求补救现实缺失的途径。在“三不朽”的价值取向中，“立德”对他们来说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立功已成为痛苦的无奈，惟一可以带给他们心灵慰藉的只有“立言”了。而且著述撰文对建安文人又是他们的强项与胜场。就连七子等待从文人自己有时亦不得不发出“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sup>[3]</sup>（《全后汉文》卷93《西征赋》）；“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恨我无时谋，譬诸具官臣”<sup>[9]</sup>（王粲《从军行》其四）的感叹，表现出谋无以出的自愧之情。正因如此，建安文人才把他们的价值追求寄寓于“立言”之上。这一方面可以借“立言”抒发他们对功业的孜孜追求的功业意识以及为此而展示出来的不屈不挠、百折不悔的英雄气概，以便让后人与时人了解、认识他们并不是仅图安己而不顾天下的壮士之心；另一方面，亦可以借助于“立言”实现其垂名后世的价值目标。

虽然我们在建安文人的别集和有关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仍把立德、立功置于立言之上的咏唱。但我们从中照样可以窥视出他们价值观中立言由余事走上主导的转变轨迹。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申述其“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之后云：“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曹丕《与王朗书》亦说过：“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在以上建安文人对立德、立功、



立言的念念不忘与价值关怀中,我们感触到的是一如既往的置立德、立功于立言之上的价值指向,是把立言做为其“志不果”、“道不行”之后的一种选择。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建安文人普遍存在着“志不果”、“道不行”的缺憾与苦闷。也就是说,在建安时期,立德、立功是作为文人的一种理想而存在的。对建安文人来说,立德、立功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形式,而不能兑现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功绩。故建安文人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取向,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就莫过于立言了。这样建安文人的立德、立功亦主要靠立言来彰显了,立言不仅具有它本身所具有的著述撰文的意义,而且被赋予了代立德、立功而立言的意义。至此建安文人价值观的主导由立德、立功到渴求立言的价值转移亦得以产生了。

建安文人的这种价值取向的转移,是建安文人“人的觉醒”的自然显现。这种显现在他们的诗文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痕迹。曹植《幽思赋》:“顾秋华而零落,感岁暮而伤心。……何余心之烦错,于翰墨之能传?”在此作者并没有直说其心为何而烦错,但结合作者生平则知,应为功业之志无法施展带来的心理烦错,且后面用一问句,其借翰墨以明志之心曲蕴含于字里行间。若此首赋在达志抒情时犹显隐曲的话,那么作者的《学官颂》则借文明志之心就显得格外率直:“歌以咏言,文以骋志。予今不述,后贤曷识。”这种借诗文书写情志之风在当时甚为普遍。应瑒《公宴诗》:“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曹睿《苦寒行》:“赋诗以写怀,伏轼泪沾纓。”又其《乐府诗》:“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襟。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应璩《百一诗》:“文章不经国,筐篋无尺书。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刘楨《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二:“追问何时会,要我以阳春。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王粲《咏史诗》:“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观。《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

建安文人这种立言的价值取向,其伊始是他们为立德、立功代而立言的,和为立言而立言的。但这种立言一旦形成一种时代风尚之后,大量文人的立言实践又为建安文人的立言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或者超出其原初意义的意义。霍松林先生经常说,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要“品学兼优,知能并重”,其中在“能”的方面,包含的重要一点就是能运用古代各种文体从事创作,至少要会用一两种文体创作,有了创作经验、感触就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古人作品内容。霍先生在此强调的创作对古代文学研究之重要作用实际是与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重视古人的创作实践对文学发展所起之推动作用相互发明、意脉通贯的。在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关注古人创作实践对古代文学所起的非凡作用。如傅璇琮先生在其《从〈张说年谱〉所想到的》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sup>[10](P52)</sup>再如罗宗强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提出:“探讨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潮,有必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作出评价。”<sup>[11](P103)</sup>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郭麟阁先生的《魏晋风流及其文潮》绪论中就明确了关于文艺思潮研究的两大内容:“一是评论魏晋时代之主要文艺理论,二是阐述作品中所蕴之思想。”<sup>[12](P130)</sup>虽然这些观点所指偏重点有所差别,但都注意到了文学创作实践、活动等本身所起的作用或蕴含的思想。就建安文人由立言而掀起的创作实践来说,其意义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如建安文人经过其创作实践在作品中已注意到了对诗歌意境的有意开拓,其典型表现就在于建安文人对比义意象有了自觉的追求。<sup>[3]</sup>要之,它使建安文人由把立言看为其立德、立功的余事变为为“三不朽”而立言的主导,由把立言视为“志不果”、“道不行”的发泄形式变为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价值追求。正是在它的孕育下诞生了把立言与经国相提并论,并视立言为经国之

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理论宣言——杨修的《答临淄侯笺》和曹丕的《典论·论文》。他们理直气壮地宣称：“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sup>[3]</sup>（《全后汉文》卷51）“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sup>[5]</sup>（《全三国文》卷8《典论·论文》）这不仅标志着建安文人立言价值观由余事走上主导的完成，而且对建安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之转变和建安文学的繁荣皆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关于后者，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 [参 考 文 献]

- [1] 朱熹. 四书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 严可均. 全后汉文[Z].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4]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5] 严可均. 全三国文[Z].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6]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7] 王运熙, 周锋. 文心雕龙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8] 鲁迅. 鲁迅全集: 1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9] 俞绍初. 建安七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0] 傅璇琮. 唐诗论丛稿[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 [11] 罗宗强. 李杜论略[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 [12] 刘跃进. 中古文学文献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13] 祝菊贤. 论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比喻意象[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4).

[责任编辑 杜 敏]

## From Salon to Stage: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of the Scholars in the Reign Title of Jian'an's Values of Establishing One's Ideas in Writing

ZHANG Zhen-long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Abstract:** The Reign Title of Jian'an was a historical phase of "human awakening". Scholars in those days pinned their guidelines in pursuit of values on expounding their ideas of moral for and making contribution to this final objective. Hence establishing their ideas in writing only by leisurely remarks. However, because these scholars generally nursed a regret and depression of "frustrated aspiration" and "failing ideal", they chose to make up for the realistic deficiencies by establishing their ideas in writing. Through their practice of writing, they managed to convert their established ideas in writing in values from salon to stage, which was marked by Yang Xiu's "The Reply to Duke of Linzi" and Cao Pi's "On Books and Records·On Writing".

**Key Words:** scholars in the Reign Title of Jian'an; values; establishing one's ideas in writing; literature in the Jian'an